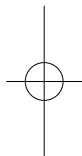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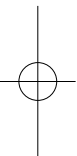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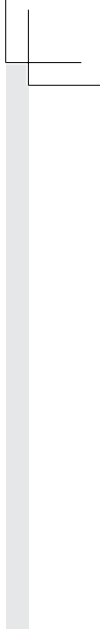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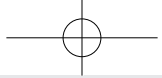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篇

成长之路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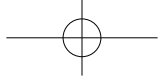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童年岁月

1922 年农历五月初七日，我出生于南京，属狗，后来为了好记，一般都记作公历五月七日。

时局动荡

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。很小的时候，南京的时局稳定过一阵子。现在看来，是北伐战争结束后的那段时间，当时的《首都计划》在拟定变化中，南京城有不少工程建设，盖了不少房子，修了政府大楼，修了中山陵。举行“奉安大典”，专门修了中山路，以便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京迁到南京。这些建设方面的零碎记忆，对我后来选择建筑专业有些影响。

没过多久，时局就变了。1931 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日本占领东北，对华北虎视眈眈，汉奸殷汝耕说要自治，也不安宁。我还记得当时在南京日本大使馆的一个官员突然“失踪”了，日本就派军舰到下关，解开炮衣准备开战，以此相威胁。后来中国警方在中山陵园找到了这个“失踪者”，闹剧被揭穿，“失踪者”被送回日本，此事悻悻收场。1932 年，我上小学三年级，又是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上海打仗。这样的大动荡接二连三。当时的国际联盟派李顿爵士来南京调查，学生列队欢迎，我住



在老城南，要去城北迎接，当时我个子小，跑得慢，还被老师打过耳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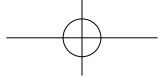
192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，世界经济萧条，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见到报纸上“经济不景气”的字样。我家里原来是做缎业生意的，这曾是南京的优势行业。历史上南京丝织业很发达，但在这样的时局下也受到了影响，商铺纷纷倒闭。我家的缎业也凋敝了，当时最多能向云南地区卖一些，因为当地的土司还有些需求。

家道中衰

我家居住在城南门谢公祠，现在已经成了大杂院。在我幼时的记忆中，第一个院子中央的石盆上有荷花，院西南有腊梅一株，正厅中悬有朱伯庐治家格言，隐约记得在第三进屋子西侧的一个院子有一棵石榴树。有两口井，一口自用，另一口通向墙外供邻居用。

我家过去也有字号，叫“吴德泰”。听我母亲说，我的祖父名吴有禄，号“寄梅”，做缎业为主。祖父有一个理念——“积财不如积德”，热心于公益事业，冬季办粥厂，夏季备解暑药，救济穷人，家中大门门联“绵世泽莫如为善，振家声还是读书”。他也是个社会活动家，1914 年间，南京曾举办“南洋劝业会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国际博览会，目的在振兴实业，我祖父是绸缎业公会的副会长，是社会上的活跃人物，口碑很好。我四五岁的时候，家里让我去街上买菜，我还记得有人指着我说：“这是‘寄梅’的孙子。”

听母亲讲，祖父生意好的时候，家里条件很好，我父亲还在念书，祖父希望他在国学上发展，后来祖父去世了，生意垮了，父亲到别家缎号帮着做事，先在“于啟泰”，后来又去了上海帮一些缎号管账。我父亲每个月寄来 20 块钱，我母亲又把首饰等物件抵押到外祖父那里，每个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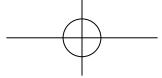
能再多拿 17 块钱，这样总共 37 块钱就是全家的生活费。

我的兄长吴良铸，长我十岁；妹妹吴素娟，小我两岁。一家人每个月靠这 37 块钱过活，非常紧张。我母亲用每个月所得既要买柴米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，包括一桶煤油，晚上点灯，油灯上面还要热菜，此外还有应酬等，生活非常困难。靠母亲操劳，各事安排得体，得到亲友的敬重。我还记得我母亲营养不良又过度操劳，一度双腿站立困难，后来靠吃麦芽糖拌着米糠恢复元气。

我哥哥书念得很好，在金陵中学读书，毕业后教书，做家庭教师，努力进取，后来考取金陵大学。读书学费的来源是任家庭教师所得，外祖父家，我三舅舅、舅母与我母亲相处很好，能够接济一些，但事后必定归还。还有一个姨娘王民华，曾任大行宫小学教师，后做小学校长，终身未婚，也能帮一点，就这样支撑了哥哥上中学、大学。

我外祖父名李耀南，字号“李光廷”（缎号）。外祖父六七十岁的时候营业很盛，家里很热闹，有很多字画匾额，但后来传至他三个儿子经营不善，逐渐衰败了，生活也大不如前，完全符合中国的谚语“富不过三代”。外祖父早年在南京九儿巷有一处豪宅，有花园、花厅，院落很大，饲养有鸽子、金鱼，后来经营不善，都衰落了。这组豪宅本来应做文化遗产保存的，比现在作为文化遗产的南捕厅“九十九间半”某房要宏大精致得多，但在新中国成立初被拆除，着实可惜。还有件事也值得一提，即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我的三表兄，名李惠成，与我同在南京钟英中学就读，后病死于外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一位党的干部来访告知，惠成当时是地下党，在日伪时期做了一些革命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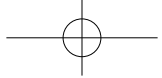
我家一直都是比较穷困的（房子现在还在，尚未被拆除）。有时我母亲常住在外祖父家，我与哥哥中午能买一碗馄饨和一个咸鸭蛋已不错



了，还得分中、晚两顿食用。我就是这种困难的境况中慢慢熬过来的。母亲安于贫穷，她常说：“生儿不如我，要钱有何用？生儿比我强，要钱有何用？”但母亲一直教育我们要争口气，做人要有骨气，要奋发有为，衣服要整洁，仪表不能垮掉，不能为人家取笑。这也影响了我和哥哥读书的态度，我们一直很努力。在那个时候，父母送我们上学，进的是“洋学堂”，要顶着保守的缎业生意人的种种闲话，父母亲一直鼓励我们兄弟读书。我名字中的“鏞”字，意即大钟，我在小学时父母为我取别号“振声”，又名“如响”，取“君子如响”“大扣之则大鸣”之意。若干年后，其他一些亲戚的孩子多穷困败落了，我们家总算克服种种困难，跟上了时代。我还有个叔父也受到我母亲的影响。我父亲成家时，我叔父六岁，母亲把叔父带大，比较有感情。他“学生意”，即帮人家从学徒、店员做起，以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蚌埠一家纸店的老板，抗日战争八年，父母亲、妹妹，包括带我及妹妹长大的孙奶奶就寄居在叔父那里（直到孙奶奶病死在蚌埠，我父亲将她的灵柩运到南京南郊牛首山我家的祖坟中安葬，墓碑：义女吴素娟立）。虽说是寄居，并未闲着，我父亲帮助料理店务，母亲里里外外照应。两位老人这八年最为欣慰的事即在我父亲五十大寿时，叔叔办了两桌酒席，为我父亲庆寿，给两位老人无限慰藉。抗战八年，两个儿子不在身边，总算熬了过来。

早年教育

1929年，我念了半年多私塾，对私塾我有两点难忘的记忆。第一，我母亲为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书包，绿色的粗布，在一个角钉了一个铜钱，书包内放了一本书（大概是《幼学琼林》），两支毛笔。毛笔是我母亲从某处觅得的，是为菩萨佛像眼睛开光用过的，据说用这支笔启蒙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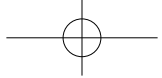
字，将来字写得好。第二，上私塾的第一天，老师带我向天地君亲师和孔夫子牌位叩过头，此后老师一直待我很好，从未打过手心。

当时江苏省的中小学教育是很优秀的，水平比较高。我的小学是在离家很近的“荷花塘”附近，原来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祠堂（俗称“曾公祠”，现在被拆除了），院子里面有两棵老梧桐树，有钟、鼓，有匾额，题字“是之谓不朽”，办得挺好。我是第一班的学生，校长章星南写得一手好字，不时有人来求字。他的儿子跟我同班，因此我们班得到较多关注。书法绘画老师叫周金声，他一直鼓励我搞绘画、工艺美术，彼此有很深的感情（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重庆街道上还碰到过）。当时我的画曾送到国际联盟去展出。

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印象很深，同学们问我能考多少，我说七八十分吧，后来得到了五十分，五年级的年级主任仇眉轩，他在路过时听到了，在课堂上狠狠地批评我：“吴良镛骄傲了，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七八十分，而是五十分！”我那时候真感无地自容。这个教训到现



幼时留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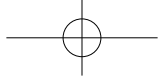


在九十多岁了还记得，让我认识到一辈子一定要兢兢业业的，稍有放松可能就会出问题。

在小学时期课外读物一为谢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，一为丰子恺的漫画。直到我上大学时还注意谢冰心的文字。

小学毕业，我没考上市公立的学校，就在私立钟英中学读书。钟英中学很有名（2014年该校恢复原校名并隆重纪念成立110周年）。当时都传说“数理精，进钟英”，校长是南京有名的数学家余介侯。在当时的政局下，钟英还重视童子军和军训的训练，所以又传说“要当兵，进钟英”。在钟英中学，我只是念到初中，教导主任陈重寅、国文教员邱建中、数学老师曹敦厚、英文老师谢良德、史地老师詹子政（后来是镇江中学的教导主任）、美术与绘画音乐老师於韵秋，我对他们很尊敬，有深刻印象，这些教育奠定了我的文化基础。学校请来的专题讲演，我特别感兴趣，我记得有次请到的是中央大学地理学家张其昀，他讲的题目是“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真相”，我得到的认识是“地大物不博”，这是第一次受到很深刻的国情教育，至今印象深刻。中学二年级学习过程中，有一件事情记得很清楚，一次考数学，我正交卷子，校长走过来（这位校长常被称道，据说每个学生的姓名都记得），校长问数学老师这个学生怎么样，曹敦厚说我是“中等水平”。就这一句话，对我的一生都很有影响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中等水平，不敢骄傲，不努力就要下滑。

小学时，东北失陷，中学的时候，华北也出了事，日本打到绥远。傅作义军队抗日，学生就将募捐所得援助绥远，支援抗日军队。后来傅作义还写信到我们学校，专门表示感谢。那时候，北京正当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之后就有部分大学生南下，向政府请愿。在南京的学生呼应，一同请愿，并且还在中山墓“哭陵”，向中山先生哭告。当时学校很怕学



生闹得不可收拾。国民党政府、学校，虽然都鼓励拯救民族危亡，但学生运动一起来，政府还是要干预，严肃对待，怕出乱子。

在抗日的大气氛下，有的高中学生就去军校参军了，初中学生积极参加童子军露营、操练。我也参加童子军，在露营中设计过一个“地图灶”，是依中国地图外形的灶台，中间圆形放锅的地方寓意“中原鼎沸”，东北方向排烟的烟火寓意“东北烽火”。这在总结露营成绩的全校大会上很受赞赏，也算是我小时候做的最受表扬的设计了，我父亲在他的晚年还记得这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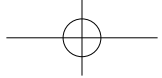
西安事变爆发，令人震惊，我还记得当时报纸上头条消息是“劫持统帅，妄作主张”，但是年龄小，具体的事情并不是很清楚。当时还听说过江西的共产党政权，但也只是听说，没有太多了解。

我高中在镇江中学（江苏省立二中），但只读了一个月后，抗日战争就爆发了，上海战事失利，就匆匆离校。

总体说来，中小学阶段的学习为未来打下了基础，很多优秀的老师起到重要作用，我一生都感激他们，时局的动荡我也一直关心，但对大局认识很模糊。

父母兄长

我小时候时局不好，父亲工书法，通国学，却找不到职业，在上海的商号待过，在律师事务所待过，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待过，充当职员，无定业，常常不在南京家中。因他基本不在家，仅在我幼年为我讲解过《孟子》、《古文观止》少数篇章。父亲为人很厚道，一直受亲友的敬重，1937年，抗日战争初期，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，我一家躲在江宁县元山镇，我外祖父李光廷家，两人志趣相投，熟知典故，共读过北宋《纲



1970 年代全家合影

鉴易知录》，引经据典，相谈甚欢，我仿佛才领会这两位老人熟读经史的学术根底。

我母亲受过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，仅能识字、阅报，但是看到南京缎业衰落的情况，坚持孩子继续走教育、读书的道路，体现一身正气、铁骨铮铮，以每月 37 块钱支撑了整个家庭，哥哥的就学、孩子的成长都要照顾，坚持“人穷志不短”，还要在亲友中保持一个“面子”，很不容易。家里虽然不富裕，但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抓得很紧，教育孩子要立志、向上、有正气，教育为人要有正义感。1965 年印度尼西亚右派政府派人冲击中国使馆，我哥哥留守，我家人建议母亲出面申请能否以照顾老人为由让铸哥回来，母亲说“不能这样！先有国后有家”。后来外贸部来人慰问，对我母亲非常尊敬，当周总理派飞机接外交人员归国，在欢迎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“红色外交战士”的参与者列队中，我母亲列为家属第一名，周总理从她身边走过，微笑致意。我哥哥晚年还专门赋诗一首，怀念母亲的教诲：